

谢保成 著

增订中国史学史

先秦至唐前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謝保成、著

增訂中國史學史

先秦至唐前期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六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订中国史学史. 先秦至唐前期 / 谢保成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568 - 0

I. ①增… II. ①谢… III. ①史学史—中国—先秦时代—唐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44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增订中国史学史
(先秦至唐前期)

谢保成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568 - 0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 86.00 元

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

（先秦至唐前期）

本卷内容包括两个阶段：中国史学的起源和形成、汉初至唐前期史学地位得到巩固确立。

中国史学的起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殷商以前的传说时代，产生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自商代至春秋时期，经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的并驾齐驱和“史”向“史官”、“史书”的演变。春秋后期至战国末年，自按年编纂的《春秋》问世，到编年体史书《左传》诞生，标志着中国史学逐渐形成。

汉初至唐前期史学地位得到巩固确立，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其一，随着《史记》、《汉书》相继出现，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独尊”地位。在断代编年史与断代纪传史“角力争先”的进程中，史学范围空前拓展，门类增多，使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并取得仅次于经学的巩固地位。其中，反映社会风貌的著述与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为此间史学成长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绚丽画卷。其二，史学的鉴戒功用经过汉初的“过秦”和东汉末的“君子有三鉴”，到唐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史、取鉴与资治三者融为一体，取得空前的社会效应。其三，反思自身的发展历程，《史通》的问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终结。

一、历史·史学·史学史

恩格斯多次论述过这样一个观点：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

① 这是《增订中国史学史》全书的《导言》，收在本卷卷首，以便读者了解全书思想和体例。

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①

这段论述，非常清楚地表达出历史、史学的关系。

（一）历史，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二：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三：包括人类自己的精神活动。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四：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其构成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不得不把它们从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因此，围绕历史演进的“总画面”弄清其构成的“各个细节”，便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五：不可复制、不能还原。仅有“科学的搜集与整理”，“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便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而“感情、生命、神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

人们对于这一过程的了解和认识是间接的，是掺杂进后人种种主观因素的。

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人类所了解的历史并不完全客观。

^① 《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第417页。

（二）史学，记述和研究历史演进以展示未来的学科

历史记述，受主客观条件局限，不可能完整、全面，还往往被扭曲或伪造。

不具备记述条件，往事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不知夹杂了多少口传者和听受者的主观色彩。现今一件事几经辗转相传必定走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何况古代，一传就是数十年、上百年、上千年，怎么可能保留“原汁原味”，更不要说一件事被无意曲解或有意歪曲传播了。

具备记述条件，如唐宋以下设置史馆专门搜集各项史料，形成编纂《日历》、《时政记》、《实录》、《国史》的制度，仍然不可能记述完整、全面。一是搜集史料的制度有局限，记述范围不可能面面俱到。二是专司记录之人，居庙堂之高则不详知江湖之事，居江湖之远则更无法了解庙堂之事。三是精神活动，诸如感情、生命、神采以及融入社会生活的思想、风尚、习俗等，更非笔录、言传所能完全准确表述。四是随着史学功用的政治化、史学思想的伦理化、修史制度的程式化，修史中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政治思想决定修史的主导思想，主流思潮决定修史者的基本意识，修史制度局限史书的记述范围，以及修史者个人的“任情褒贬”、“爱憎由己”。记述历史演进过程，往往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客观上造成史有佚文，特别是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二是主观上“高下在心”，或“为尊（亲）者讳”，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歪曲史实；三是为“利禄”、“形势”驱使，编造伪书、渲染伪史。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人们所见历史记述，已不是“纯粹”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因此需要对所见各种历史记述进行认真的研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弄清真相，二是进行诠释。弄清真相，分辨客观实际与主观掺杂，剔除虚假，弄清组成历史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还其本来面貌。进行诠释，是以各个不同时代的观念认识和解

释历史，用以展示未来。因而，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史学，对于同一史事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弄清真相是前提，进行诠释是使命。史学就是在弄清真相与进行诠释的交织当中不断形成一门学科的。

（三）史学史，史学的学科史

史学史作为史学的学科史，不同国家因各自的历史道路与史学遗产情况各异，便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界定。中国关于史学史的认识，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说法和影响，二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苏联思想观念影响形成的一些说法和认识。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至20世纪40年代，先后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有10余种，以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为代表，自“创造期之史学”至“革新期之史学”，下限至“现代三四十年间”。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过一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基本是史学史学科自身的问题，诸如研究对象、任务、中国史学分期、规律等，虽然延续至80年代，却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或以史学史要“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介绍出来”，或探索“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以对“史学遗产进行批评、总结”为任务，包括“史学跟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以及史学发展所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它对社会的反作用”，或将史学史研究范围确定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虽然大都认为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学科，却是在专门史层面上认识这一学科，忽略了其更本质的一面——学科史。

作为专门史，史学史同政治制度史、土地制度史、社会生活史、思想文化史等，都是以过往社会中这些领域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但史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些专门史，还有着同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中数学、化学等学科相同的一方面，是一门学科史。而上述的那些专门史，则非学科史。学科史既包括作为专门史的一方面，又包括学科自身发展的一方面，二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是史学史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不容忽视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史学史仅仅被当作专门史，基本沿袭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这一认识：“史学史是研究人类全部历史思想的”，“是社会思想史的一部分”。以“历史理论”居研究之首，使史学史与历史理论交叉。20 世纪 80 年代，对什么是“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逐渐有所区分：以认识和解释过往社会（即客观历史）的理论，叫作历史理论，或广义史学理论；以关于史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叫作史学理论，或狭义史学理论。然而，在实际上仍然只谈历史理论而忽略学科自身的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进国外历史理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种引进基本处于介绍状态，并未见切实地运用到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之中。只有外国历史理论的介绍，没有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难免不使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同行误以为史学史研究就是史学理论的介绍和检讨，这种状况几乎取代了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与此同时，以现有的认识进行的史学史研究，又差不多以史学思想研究为基本内容，且有网罗“全部历史思想、社会思想”之势。这种研究，往往以相当篇幅论述、解读子部书中某些并无实际影响、但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反而遗弃史部书中对当时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史书编纂影响深远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仅有思辨而无史实，既没有客观历史实际，也没有史学演进实际，不是史学，也不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同样，由于缺乏对史学史作为学科史的认识，将两个二级学科

混在一起，以史学史研究包括历史文献学研究，造成对两个学科认识的混乱，以致无人问津两个学科的分与联系。这使得不少从事中国史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仁误以为史学史只是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研究，对于史书的研究只不过史学批评而已。

史学发展到 21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及其分支学科研究，中外史学交往的研究，中国史研究与诸多专门史的关系，诸如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法制史、经济史、宗教史、民俗史，究竟属于政治学、军事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各个学科的分支，还是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凡此种种，既是 21 世纪史学面临的“前沿”问题，也是写 21 世纪中国史学史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趋势及其深刻的内涵，在相关学科发展中的位置，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应当包括中国史学自身全方位的发展，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仅包括中国古代史学的全方位发展，还包括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需要认真总结现当代史学的发展，既要“纵通”，又要“横通”。

具体来说，中国史学史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史家、史书、史学、史法、趋势以及制度。

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家的活动，特别史家的群体活动，可见其所处时代意识、普遍关注的史学问题、相互间的吸收借鉴或批驳责难，据以探知此时代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发展演进的总体态势。

史书，是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综合了史家活动、思想意识、所记史事、取材范围、编纂体例、研究方法、传布影响，以及个人才识与“心术”，甚至可以窥其心路乃至某些“潜台词”的隐喻。

史学，是“史”之成学的历程，包括起源、演进、阶段划分、范围拓展、分支出现、与相关学科关系以及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形成的

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念的演变等。近代以来中外对于“史学”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需要仔细区分，不可笼统地以异域的“史学”概念来“界定”中国的史学。

史法，是史学得以形成、发展的方法，包括历史编纂法和历史研究法两大基本方面。史法的不断进步，推动着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没有历史编纂法和历史研究法，就没有系统的史书编纂和系统的历史研究。面对杂乱无章、零散无序的历史遗存，如自宋以来至 20 世纪初的上千件彝器，除了当古玩鉴赏，对于认识历史几无所用。但当两周金文辞编排成大系、“二重证据法”广泛运用后，这些历史遗存便成为认识和研究古史的必不可少的依据。

趋势，既包括各发展阶段史学演变趋势，又包括梁启超所说“最近史学的趋势”或时下所云“史学前沿”，更包括某些具体史学现象或问题的趋势，如修史思想的演变、史志编纂的因革、史学分支的发展、疑古与辨伪的同步，等等。

制度，主要指修史制度，这是中国史学的独特处，确保中国历史资料积累、史书编纂的经久不衰、前后衔接。

（四）本书编写原则

史学史作为学科史，属学术史性质，应该充分地写出其学术价值，如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学科的发展建设等。

在上述基本认识下，本书编写以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为基本线索，自“史”的产生起，采取按时间跨度和史书系列相结合的框架，叙史家、史书、史学、史法演进、修史制度等基本内容，分析发展演变趋势，贯通前后，直至 20 世纪中期。

史家活动、史学著作是反映史学的两大基本要素，而史书是各个时代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史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本书以史家为主体、史书为主干，详开创、重划时代者。

史家，写其与史学相关的经历、思想、著述、影响等，不写成史家个人传记。近代以来史家，注意其前后变化。

中国史书繁复，不可能尽数阅读，本书编写以书后所附《基本史书书目》为据，通过系统阅读来揭示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演进之迹。

史书编纂成系列是中国史学传统之一，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本书编写以形成系列的史书作为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

具体史书考察，结合所述史事展开上述各项内容，既别于历史文献研究，又不同于书目提要。

史部书以外的其他史料，包括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简牍、各类文书以及反映社会各个方面、描述社会风貌的文学作品等。

有可观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点而不涉史事的子部书，不作专门叙述，仅作为时代意识、思想背景和研究材料引述。

论述史学，从“史”之源起探究，察其成“学”的历程，包括范围拓展、方法进步、思想演变等。各时段反映社会风貌的史书、少数民族史学以及通俗史学、佛教史学等，均有一定篇章。

关于史法，不论历史编纂法还是历史研究法，均结合史书编纂和史事考察的具体实际，既区分史书编纂的差异，又从考异、辨伪等具体实践中探寻治史方法的运用，以别于“史学概论”对史学方法的一般性概述。

学术史不同于政治史，本书以史学自身发展进行分段，不以皇朝兴亡为单元，不写成一代接续一代的断代史学。同一时间跨度内每一系列史书所反映的史学风貌，按朝代先后顺序叙述，以见其在各朝各代的因革、流变。具体时段划分，见后面的《史学发展基本线索》。

历史理论对于史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必须高度重视。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只是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而历史理论属于更高一级的哲学、史学两大学科，是哲学、史学两大学科研究的范围。本书

关注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非主流意识如何影响和干预当时的史学，包括史家的个人意识、取材的倾向、史书编纂的旨趣、史书中反映的思想等，但不把历史理论当作研究对象，混淆与哲学、史学两大学科的界限。本书对历史认识、史学思想的分析考察，或在相关处设章、节，或结合史家、史书，分别进行论述。

史学是记述和研究历史演进的学科，本书编写首先是弄清基本史实，弄清当时的实际，包括思想实际，尽可能提供相关的基本知识，然后进行考述、分析、评论。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兼以考异，寓论于史，力避残缺不全的知识，不作缺乏基础知识的空泛议论。

史学史作为学科史，同样有本学科的史料学。本书力求史料运用完整、准确。引用的史料，绝大多数都是史学史学科的基础史料，既为读者提供较为系统的基本素材，又可减少查找、检索的麻烦。

二、如何认识中国史学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以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形成诸多特征与传统，但又利弊交织、错综纷杂。在系统追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之前，先对这些基本问题作一简要说明，以期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

（一）史学发展基本线索

中国史学的发展，大体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一致。一方面，史

学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相应发展；另一方面，史学自身又有一个认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过程，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鉴于如此的客观实际，在认识中国史学发展阶段时，就不能不突破历史朝代的界限，探寻出其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历来就有不同的认识。综合多年研究所得，本书将 20 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秦以前为史学形成期，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确立期，中唐至清中期为史学发展期，清中期以来为史学变革期。变革期，新旧、中外史学碰撞，又分三小段：增其新而不变旧（19 世纪中至 19 世纪末）、新史学兴起（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末）、渐露新格局（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前三期已成“过去时”，第四期尚在“进行时”。

中国史学的起源，经过漫长的岁月。殷商以前的传说时代，产生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自商代至春秋时期，经历了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的并驾齐驱和“史”向“史官”、“史书”的演进。春秋后期至战国末年，自按年编纂的《春秋》问世到编年体史书《左传》诞生，标志着中国史学逐渐形成。

汉初至唐前期史学地位得到巩固确立，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其一，随着《史记》、《汉书》相继出现，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在断代编年史与断代纪传史“角力争先”的进程中，史学范围第一次得到拓展，门类增加，最终使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并取得仅次于经学的巩固地位。反映社会风貌的史著与少数民族史学的瞩目成就，为此间史学成长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绚丽画卷。其二，史学的鉴戒功用经过汉初的“过秦”和东汉末的“君子有三鉴”，到唐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史、取鉴与资治三者融为一体，取得了空前的社会效应，推动了史学的健康发展。其三，反思自身历程，《史通》的问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终结。

中唐至清中期，是史学分支发展、古典史学终结阶段。旨在认

识社会结构的《通典》与“三通”系列的形成，侧重治乱兴衰之迹的《资治通鉴》及其流变，连同已然程式化的各皇朝纪传体“正史”，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三大主干。自《元和郡县图志》始，至元、明、清修“一统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总志系列，与各“正史”地理志构成中国方域史的基本骨干，展示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风采。分述一方之志，自宋代开始发达起来，至明、清逐渐深入社会，省、府、州、县志的续修，成为史部分类中最大的一个门类。视野不断拓展的记域外之作，反映出中华帝国认识外部世界的艰难历程。史学方法不断进步，考异、金石、辨伪等逐渐成为史学的重要分支。各类反映社会风貌、记述专门之学的史著应运而生，更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史家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出现“以心不以迹”的说法，强调褒贬义例，逐渐形成“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趋势，史评更趋伦理化。同时，出现另一种倾向——史学的通俗化和平民化趋势。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大量涌现，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接连问世，是史学从殿堂走向市井的必然产物。被皇家修史排斥的佛教传播史出现系列——高僧传，既为中国史学的一种奇特现象，又为世界佛教史学中的一枝独秀。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动激起“经世”思想，影响清前期的风气，一项“稽古右文”之策遏制了“经世”思想的扩展。皇家纂修史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覆盖了史部各个主要门类，显示出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朝廷留给读书人一条狭窄的“做学问”之路，便有了“乾嘉考史”的繁兴。不应忘记的是，乾嘉时期还有一部“不以风气为轻重”的《文史通义》，不仅对古典史学进行全面总结，更预示着其后的“思想解放”，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划时代标志。

19世纪中叶，东方古国紧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巨变，古典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开始突破昔日的格局，跨出变革的步伐。最初60年，增其新而不变

旧，是一个过渡阶段。20 世纪初始，出现猛烈抨击传统史学、提倡“史界革命”的新潮，兴起发掘本土文化遗存、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潮流，推动中国史学第一次发生飞跃，迈开近代化的步履。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形成两大史学主干——马克思主义史学团队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展示出后来史学的基本走势。

（二）传统史学基本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摇篮之一，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相比，为时稍晚。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大约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同步，而且中外各国所经历程大体一致：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人们对于过往的大事，通过口耳相传，辅以象形文字帮助记忆，形成关于远古的传说；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便成为历史记录的前提。随后，人们渐渐能够以文字将头脑中的印象用书面形式表述出来，进而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出现了史著。《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固然影响巨大，但仅仅是中国史学起源阶段的最高成就，尚不足以完全代表中国的传统史学。从《史记》、《汉书》起，中国史学延绵不绝，形成独具一格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自己诸多的特征。功用趋于政治化、思想日益伦理化、史料积累制度化、皇家修史程式化、史书形式多样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表征。

1. 功用趋于政治化

史学功用，实际是治史宗旨，逐渐被单一化为政治功用。

早在商周之际，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名句出现。孔孟时代，出现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但以史学著作系统而完整地表达史学功用的是司马迁，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

完整地理解这段话，至少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的意思：

其一，广泛搜集、精审考辨史料，保证叙事翔实准确，既不夸大其词，又要揭出真相，如班固称赞司马迁那样，“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其二，在搜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之一。“成败兴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内容，“稽其理”，即不仅叙述“成败兴坏”的现象，还要探寻“成败兴坏”的原因。具体来讲，从《史记》各篇叙述中可分作四点。第一点，“辨是非，故长于治人”^②，通过历史辨明是非，进行长久统治。第二点，“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③，以古鉴今，是为了“自镜”。第三点，宣“明主”，载“圣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④。第四点，“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⑤，进行教化。

其三，探讨天和人的关系、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清理被神化的上古史，清理附会或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神意。

其四，“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历史演变之迹，探寻历史发展趋势。要“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全面考察历史全过程。不沾沾于所谓“盛世”，要“盛中观衰”，从社会弊端中预见其变化趋势。

①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②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③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④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⑤ 《史记》卷5《秦本纪》。